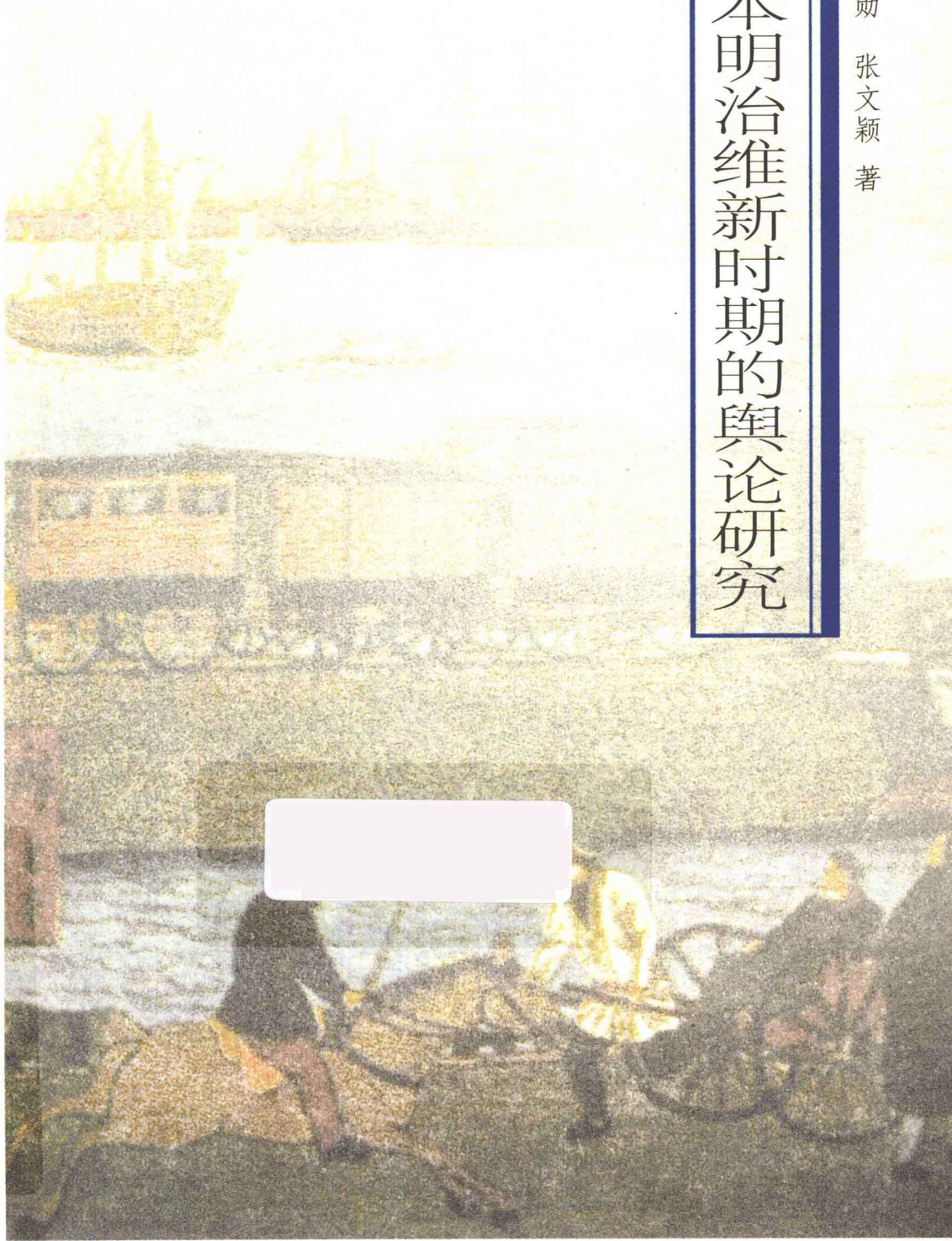


王文勋 张文颖 著

#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舆论研究



日本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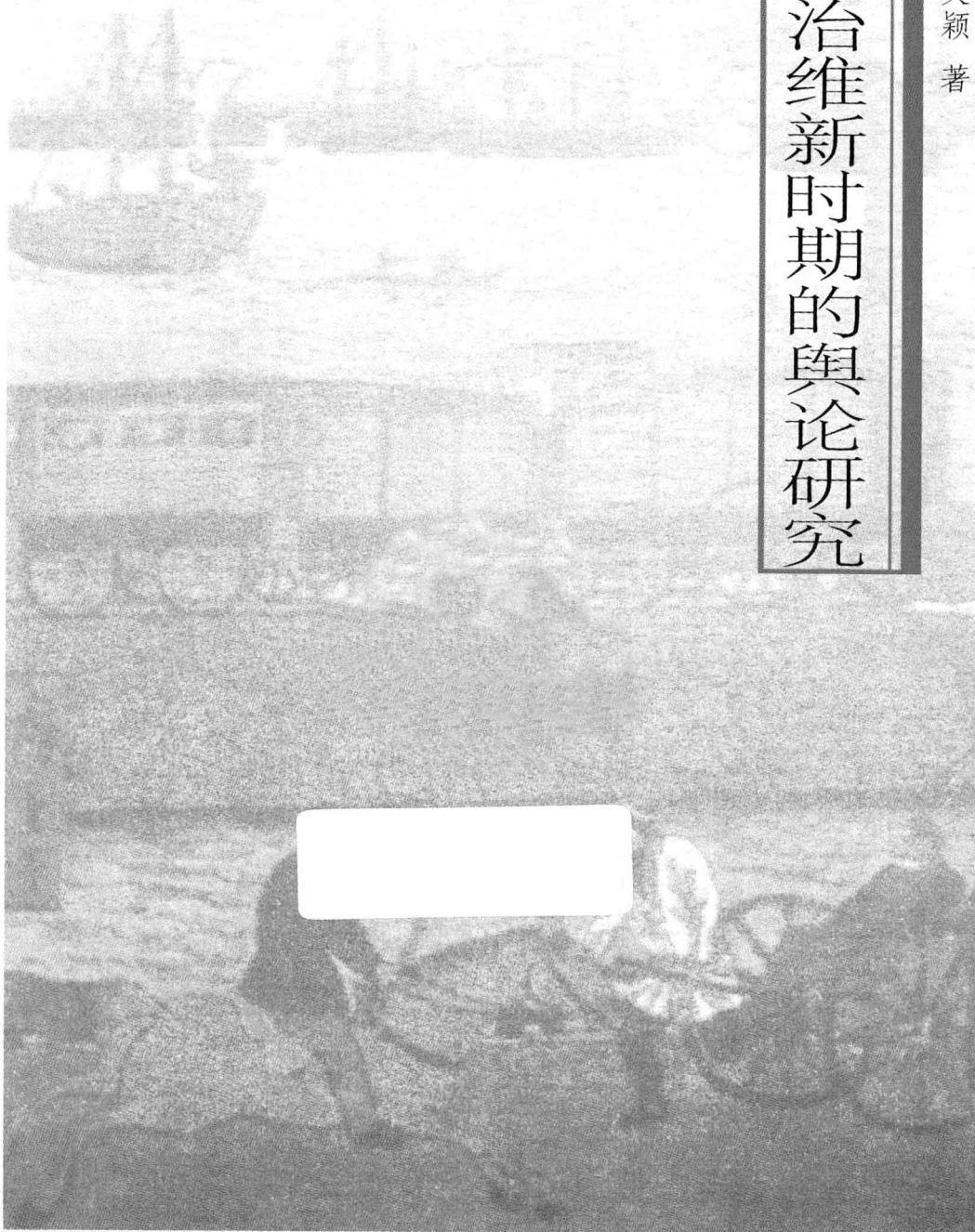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王文勋 张文颖 著

#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舆论研究

日本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舆论研究/王文勋,张文颖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0

(日本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ISBN 978-7-5657-0805-3

I. ①日… II. ①王… ②张… III. ①明治维新(1868)—舆论—研究

IV. ①K313.4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5151 号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舆论研究

著 者 王文勋 张文颖

策 划 冬 妮

责任编辑 张 旭 张 玥

责任印制 张 玥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0805-3/K·0805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 目 录 >>>> CONTENTS

## 绪 论 / 1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
- 二、学术现状和研究目标 / 3
- 三、研究方法及全书结构 / 5

## 第一章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舆论形成的背景 / 7

- 第一节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舆论的政治、经济背景 / 7
- 第二节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舆论形成的文化与传媒背景 / 23

## 第二章 明治维新时期的舆论状况 / 50

- 第一节 维新前夜的舆论状况——“尊王攘夷”舆论的形成 / 50
- 第二节 维新变革时期的舆论战：由“尊王攘夷”到“倒幕开国” / 63
- 第三节 明治政府新政策下的舆论 / 72

## 第三章 明治维新时期舆论的作用 / 112

- 第一节 舆论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 / 112
- 第二节 舆论领袖的启蒙作用 / 128
- 第三节 舆论对文明开化政策的推动作用 / 148

第四章 明治维新时期舆论的影响 / 160

第一节 明治维新时期舆论对日本近代政治制度确立的影响 / 160

第二节 明治维新时期的舆论对中国戊戌变法舆论领袖的影响 / 171

结 语 / 197

附 录 / 200

主要参考文献 / 201

# 绪 论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一)选题的目的

19世纪末期,日本仍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封建制度正在没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在萌芽之中,面临被西方列强蚕食鲸吞的危险,但是一场变革改变了日本的历史,日本如脱胎换骨般摆脱了闭关自守、封建落后的局面,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枷锁,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一个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并很快成为亚洲强国,这就是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sup>①</sup>的明治维新。

在此期间,作为历史变革时期风向标的舆论也空前活跃,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新的舆论传播媒介和方式——报纸、杂志、演说等出现并蓬勃发展,迎来了日本舆论“最初的激烈论战的年代”,<sup>②</sup>在政治论争、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国民整体处于兴奋状态,新闻业在这种大环境

---

① 吕理州:《明治维新》,海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封面。

② 山本文雄:《日本大众传媒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的刺激下,发展极为迅猛……”<sup>①</sup>因此,明治维新被看作是日本现代新闻蓬勃发展的开始。

在这一段社会变革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传媒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产生了怎样的舆论?其状况如何?舆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都有哪些舆论领袖引导着日本民众参与这场变革?舆论在这场变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对日本产生了什么影响?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面临着被殖民化的压力,中国的维新人士开始了救国救民的探索,而此前的“东隅一小国”通过一场变法维新,不仅摆脱了被殖民化的危险,还成了亚洲强国。在与日本当初的处境非常相似的中国,许多维新先驱开始了救国救民的探索,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近邻日本,开始学习日本的维新变法,以图强我中华。在学习过程中,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舆论对中国戊戌变法的舆论领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一个舆论学的研究者,笔者拟对这一段时期的舆论进行探索和研究。

## (二) 研究的意义

1. 目前国内外尚无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舆论的系统研究,本书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项空白。

日本和中国一样,经过了漫长的封建统治,百姓在重重重压和禁锢下早已麻木不仁,而明治维新的仁人志士利用舆论唤醒民众,推翻了幕府长达两个半多世纪的封建统治。明治政府成立后,逐步撕下了当初承诺的民主、自由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维新中力量最强的萨摩、长州两藩的专制政府,加上变革政策的实施势必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动荡,

---

<sup>①</sup> 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页。

人心不安,反对政府专制、要求民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舆论斗争蓬勃进行的情况下,新政府一方面在给予人民自由权利方面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利用舆论诱导人心、推动变革政策的实施,最终取得了维新的成功。本书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资料的收集、研究,对这一时期的舆论状况进行了梳理、分析,尽量展现出当时舆论的真实面貌。在对当时舆论状况的准确把握下,笔者结合舆论学的理论从作用和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以一个崭新的视角解读了明治维新。

2. 通过对明治维新时期舆论作用及影响的研究,笔者对社会变革时期的舆论状况、作用及影响进行探索。在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状况有一定的特点,一般是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变革政策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舆论究竟有什么特点?能起到什么作用?会产生什么影响?本书试图从某种意义上回答这个问题,希望能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 二、学术现状和研究目标

目前学界对于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论述颇丰,但是对于这一时期舆论的研究并不多见,除了日本学者在研究媒体的著作中对这一段时期的舆论有少量涉猎外,国内外还没有直接系统研究这一时期舆论的著述。全面系统地考察明治维新时期的舆论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它的作用及对中日两国产生的影响,尚属首次。

要研究这一时段的舆论状况、作用及影响,必须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做一个全面而精确的介绍,因此,一些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著作是必须要参考的资料。如信夫清三郎的《日本政治史》,伊文成、马家骏主编的《明治维新史》,井上清的《日本现代史》,田中彰的《日本历史》等等,只有全面了解了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状况和历史地位,对这一段时期的历史、



文化、传媒发展状况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才能够正确把握这一段时期舆论的状况、作用和影响。

在研究明治维新时期舆论状况时,这一时期的新闻发展史、传媒发展史的学术成果是必不可少的参考。包括保谷彻编写的《幕末维新和情报》、明治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明治文化全集》、美土路昌一的《明治大正史(言论篇)》、山本文雄的《日本大众传媒史》、甘利璋八的《日本报纸的黎明》等著作。武藤直夫的《那个时代的氛围》和《明治文化全集》中的“报纸篇”、“杂志篇”汇集了这一时期的报刊的报道内容,为这一时期的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料。而关于这一时期传媒史的研究著作给研究其舆论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除了从后人研究的史料中挖掘之外,笔者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了当时的舆论状况,就是对当时置身于其中的“舆论人”的著述进行了考察,如福泽谕吉、末广铁肠、福地源一郎、德富苏峰等人的自传或者报人所写的新闻从业经历。像福泽谕吉的《福泽谕吉自传》、末广铁肠的《新闻经历谈》、福地源一郎的《新闻纸实历》等。从他们的传记或从事新闻工作的实践中探索当时舆论的实际状况。

基于对以上文献史料的研究,笔者希望能通过努力达到以下目标:第一,由于明治维新这一段历史充满了魅力,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变革政策等长期关注,而从舆论学的角度去研究尚属空白,故本书从舆论学的角度去发掘、探索,希望能为研究明治维新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第二,对于这一段时期的舆论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和考察,在此基础上力图探索舆论在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对日本产生了什么影响,对那时遭遇相似的邻邦中国的戊戌变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试图给当今社会提供一定的借鉴。第三,在研究的过程中,力图使理论与历史事实相结合,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刘建明的《舆论传播》、《社

社会学舆论原理》等著作是当今比较成体系的舆论学著作,对本书的论述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研究这一时期舆论的时候,笔者力图结合舆论学的理论对这一时期的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

### 三、研究方法及全书结构

#### (一)历史文献分析法

本书主要研究对象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舆论,因此需要对这一时期舆论产生的背景及当时的舆论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它的作用和影响。本书就是在舆论学的理论框架之下,对这一历史上非常成功的变革时期的舆论状况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它的作用及影响,从而积累历史经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 (二)逻辑分析法

逻辑分析法就是要对研究的命题进行分类,并且对其中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正如马克思所说,“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然后通过对事物之间关系的综合归纳,进而找到彼此之间的关系”。逻辑分析法具有典型性、抽象概括性的特点。选取日本当时典型的舆论传播手段——报纸、杂志、演说等,并借助舆论学的理论进行分析,通过逻辑分析法,概括出其所起的作用及对中、日两国产生的影响。

#### (三)制度分析法与个案分析法

此外本书还采取了制度分析法,对这一时期的新闻制度,即当时的报纸条例及集会条例等制度进行具体分析。还采取了个案分析法,如对某

一报纸的报道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结论,使之成为支撑本书观点的论据。

全书结构: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交代了明治维新时期舆论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传媒背景;介绍了幕末维新前的社会状况,阐述了舆论产生的背景。第二章分维新前夜、维新变革时期、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三个阶段对这一时期的舆论进行了研究、考察。第三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运用舆论学理论对这一时期舆论产生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第四章对明治维新时期舆论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在研究这一时期舆论的影响时,分别从对日本近代政治制度产生的影响和对中国戊戌变法舆论领袖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 第一章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舆论形成的背景

## 第一节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舆论的政治、经济背景

### 一、独特的幕藩体制

12世纪末期,天皇已只是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权掌握在幕府手中,天皇只是作为精神上的最高权威存在而已。1603年,大封建领主德川家康通过一场统一兼并战争迫使天皇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建立了幕府,成为全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开始了自1603年至1868年长达265年的封建统治,史称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最兴盛也是最后的阶段。德川政权建立以后,更是大权独揽,不允许朝廷过问政治,天皇把内政外交一切政治权力都委任给德川家成为定例。被称为征夷大将军的是德川幕府的最高首领,是全国最大的封建领主,幕府的直辖领地每年可收获大米将近700万石,约占全国大米总收获量的四分之一。将军还直接拥有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户、京都和大阪三大城市(即所谓“三都”),以及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

长崎。<sup>①</sup>此外，幕府还占有佐渡、伊豆等重要矿山，并垄断了铸币权，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将军还拥有“旗本”、“御家人”等武装力量 2 万余人，具备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德川幕府对天皇的经济却控制得很严格，天皇只拥有年产约 3 万石的领地，这些领地的支配权也是由幕府的官吏来掌握的。天皇和他身边的贵族公卿们不但政治上无权无势，经济上也穷困潦倒，天皇还受幕府设置于京都的“所司代”的严密监视。但“天皇”对于日本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实际上之所以采取“天皇”这个称号，是从中国对君主的称呼“皇帝”学来的。尽管中国的皇帝认为自己是受天命来做皇帝的，但是这个天命既可授予这个皇帝，也可授予其他的人，即包含了改朝换代的革命思想，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才会出现流血革命、改朝换代的现象。日本统治者采用了“天皇”的称号，“‘天皇’这个概念包含的思想是把天命思想里革命的那部分有意排除掉了，皇统是一家的血脉，具体的、持续化了的一家血脉，永远也不会转移，自己是受天命而存在的，是神的子孙。”<sup>②</sup>天皇是万世一系神的子孙，为整个封建秩序的最高精神权威，有着非凡的号召力量，在德川时代仍然如此，尽管幕府将军大权独揽，但历任将军的“征夷大将军”称号也还是由天皇来授予的。

当时的日本被分割为 200 多个独立的藩国，每个藩的领地都像一个独立的王国，可以向农民收取年贡，可以自己发行货币，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权力，还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藩主又称大名，将军通过大名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大名又有自己的家臣，称武士。武士拥有领地，领取俸禄，战时跟随大名出征打仗。为了防止大名反叛，幕府把各藩按照亲疏远近分为亲藩、谱代和外样。第一类称亲藩，是征夷大将军的亲属所在的藩

① 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7 页。

② 佐藤弘夫著：『概説日本思想史』，ミネルプア書房 2005 年版，21 ページ。

属,在这里将产生将军的继任者;第二类为谱代,是早年跟随征夷大将军征战四方的忠心家臣。亲藩、谱代这两类大名的领地都被封在关东或近畿附近,在幕府担任老中、奉行等重要职务。外样大名是过去和德川氏并列的诸侯,在战争中转投幕府,仍不能取得幕府信任,这类大名一般被封在远离江户的边疆地区。外样大名以西部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的势力最为强大。

各藩藩主都必须定期到江户参谒将军,称“参觐交代制”(或称“参勤交代制”),即规定大名的妻子必须留在江户做人质,大名则须每隔一年携带礼物前往江户参觐。参觐交代制加强了幕府的集权统治,有利于防止藩国结党行动。而且,在江户建造邸宅、供养妻室家臣的费用及参觐的路费,都由大名自己承担,也削弱了大名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各地大名为弥补其巨大开支,在大阪、江户等地建立仓储,贩卖其从领地收来的稻米,客观上促进了以大阪、江户为中心的地区商业的发展。同时,各地大名定期轮班参觐,也促进了江户与各地区间的交通运输的发展,增强了各地的文化交流。“参觐交代制”削弱了大名特别是外样大名的政治经济势力,但也加剧了他们与德川幕府之间潜在的矛盾,这就成为“外样大名”后来参加反幕府斗争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实力强大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各藩,后来成为倒幕的根据地。

在江户时代,幕府为加强对人民的控制,维持幕藩体制的稳定,制定了身份制度,分为士、农、工、商等几个等级。“士”指武士,“农”指农民,“工”、“商”差别不大,指商人与手工业者,他们被统称为“町人”。武士是这个等级社会的最上层,修习武艺与学问,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6%—7%左右,将军和藩主把自己领地的一部分分给各级别武士,但是绝大多数的武士只能领取俸禄米而没有领地。他们享有种种特权,比如免交租税、平时可以佩刀,只要他认为有理由,就可以随便杀死任何的平民而不

受法律制裁。将军通过各大名实现对其的统治。农民、“町人”等平民的地位都很低下。幕府对农民的劳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极力榨取其全部的剩余劳动;德川幕府“重农轻商”,对“町人”的活动也多方限制,不同等级的人不能通婚,日常生活如从事的职业、服饰打扮都受到身份的严格限制,不能越雷池半步。幕府还推行儒学教育,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另外,在各阶层内的等级制度也十分严格,如武士就包括将军、大名、家老、家臣、从者(足轻、仲间)等级别,农民中有“持高”农民与“无高”农民之分;町人也有复杂的门第与身份差别。在四民之下的还有秽多、非人等被称为“贱民”的阶层,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这样,幕府通过分封领地和提供俸禄,与各大名、武士结成牢固的主从关系,再通过制定严格的身份法度规范,明确大名、武士及各阶层的权利与义务,确保大名既能管理好地方事务,又不会威胁到幕府的统治,并且利用“参觐交代制”等各种手段削弱大名对幕府的对抗力。为进一步巩固幕藩体制,幕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禁中及公家诸法度》,限制皇室的权力及活动范围,同时也对大名及武士实行严格控制。1615年,幕府颁布《武家诸法令》,规定了大名及武士阶层的活动准则及对幕府的义务。通过采取这一系列的措施,虽然当时的日本呈现割据状态,但幕藩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还是加强了封建统治,使其幕府政权存在了200多年。但实际上这种封建体制是一种貌似严密实则畸形的政治体制,上有天皇下有强藩,尽管幕府竭尽所能加强防范,但内部还是充满着尖锐的矛盾。

## 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加上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增加收入,采取了扶持和奖励农业的措施,江户时代的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扩大

耕地面积,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使沼泽变成了良田。在“江户初期,日本全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63万町步,江户中期已经达到297万町步,成为日本农业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开发新田的辉煌时期。”<sup>①</sup>

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性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桑、棉花、烟草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显著提高。一部分农民开始有了年贡之外的剩余产品。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地主、富农雇佣贫雇农进行土地的耕种,同时在农村开设手工作坊,进行商品的经营,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同农业分离。商人把农民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销往外地。城市商人也向农村收购产品,牟取利润。封建领主出于生活与财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励农民进行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商品经济在农村出现了,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冲击。

丝织业在当时是日本手工业的一个主要部门,在纺织行业首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战后的“小千谷绢绸”产地,一些村民把自己的土地租给邻村的农民,自己则专营丝织业。这时候,棉纺织业也有了充分的发展。在棉纺织业的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专业性的分工,如脱籽、弹花、纺纱、染色、织制成品等环节。随着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农业同手工业分离,出现了地区性的分工,形成了很多手工业中心。除丝织业和棉纺织业以外,其他手工业如造纸、酿酒、制糖等也在全国各地普遍发展起来。手工业中的采矿业比较突出,幕府也非常重视金银铜矿的开采。由于茶道的兴盛,茶具的需求增加,形成了制陶业的主要产地,如尾张的“瀬河烧”、肥前的“有田烧”等极为有名。酿造业以畿内的伊丹和滩五乡最负盛名。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造成了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日益

---

<sup>①</sup> 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解体,促进了农村中阶级的分化,大量贫苦农民逐渐失去了土地,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和富农手中。同时随着手工业逐渐脱离农业,加上地区性分工的发展,使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这就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随着各产业的兴旺发达,城市的发展进一步繁荣。到17世纪末,全国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户、大阪、京都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大阪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商业空前繁荣,全国各地的主要商品都通过大阪运往江户,如畿内的油类、棉花,松前的海带,琉球的砂糖等等。江户不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据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有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大阪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在这里形成了江户时代全国市场的中心,另一个繁华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纪初城内外人口达到36万左右。城市的兴盛使商业更加繁荣。商业的发展还推动了信贷制度的建立,出现了办理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的两替屋,类似于现在的银行。交通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交通网,陆路有五条干线,海路有四条,还产生了“町飞脚”这样的民间邮递行业会,开展定期邮递业务。为保证商业的利益,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起来,不断地积蓄着财富,出现了鸿池、小野、三井等称雄全国的大商人。

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商品生产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强。例如秋田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就来自藩外的大阪。这种生产方式打破了藩与藩的界限,使商品生产的市场日益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把农民卷入了商品生产的环流之中。农村不仅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时也成为简单加工业的工厂。商人会向农民统购一定的手工产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费;地主富农开设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等等,都是这一变化的具体体现。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